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观

杨 鲁 慧^{a, b}

(山东大学 a.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b. 亚太研究所 济南 250100)

摘 要: 中国的对外战略究竟是什么样的选择, 已成为当今世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从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厚积淀中, 提出一系列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观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以共存观和共建观及共享观为核心内涵, 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发展。“一带一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以合作共赢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构建新型合作观、树立新型共赢观, 走向新型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型大国观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模式未来走向, 为解决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难题与困境, 提出凝聚中国智慧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答案和道路, 为国际社会提供有效的全球公共产品。

关键词: 新型大国观; 命运共同体; 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 新型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594(2018) 02 - 0042 - 06

DOI: 10.16354/j.cnki.23-1013/d.2018.02.006

21 世纪以来, 国际体系就处于不断地调整与转型之中, 国际力量对比正在重新组合调整,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全球发展格局向着更加均衡的多极化趋向发展。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世人对国际格局历史性演变的忧虑与洞察, 焦点主要汇聚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国际秩序变革等问题的新动态走势上, 并且关注世界变局中的中国之道与战略选择, 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转型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是国家的立身之所, 面对转型变革中的国际体系, 当代中国如何应对并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 与其对国际格局及变化的认知判断能力紧密相关。2017 年 10 月,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做出顶层设计, 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具体阐述, 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1]的世界。其超越党派、国家和制度的异同, 使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 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合作

共赢的新型大国观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以共存观和共建观及共享观为核心内涵, 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发展。“一带一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深化互利共赢格局, 为亚欧非沿线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构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一、国际格局转型变革: 中国新型大国外交开启的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格局从美苏两极争霸转向一超多强,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决定着世界体系的整体运行机制及发展走向, 国际政治格局的本质是一超独霸。当今国际格局已从一超多强走向更加均衡的多极化, 其根本意义在于: 世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已呈现为群体性崛起, 意蕴着非西方世界正在打破西方世界几百年来经济垄断和主导世界的地位, 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已举足轻重。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 标志着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历史变革, 中国正站在人

收稿日期: 2017 - 11 - 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的项目资助“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格局与‘一带一路’国别政策研究”、教育部 2017 年十九大专项课题研究“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命运共同体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鲁慧(1956—), 女, 山东济南人, 所长, 博士,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 从事东北亚政治安全和中国周边外交及东亚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类社会发展新的转折点上,其将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带来深刻的影响,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这一切表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发生结构性变动,美国的超强霸主地位受到历史性挑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转型,标示着一个多极化时代的开始”^[2]。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由于世界力量格局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大变化,国际秩序的调整不可避免,全球治理将从‘西方治理’一统天下,不可逆转地转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各国的共同心愿^[3]。日趋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中国,也预示着世界已把中国推到全球经济政治舞台的前沿阵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与国际秩序正进入深度互动和新型互动的新时期,中国与既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何相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在新型互动期面临的新命题。从更深的层次看,国际新格局在构建,国际新秩序在磨合,国际关系在重组,国际重点议题在调整。因此,西方世界的裂变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弱,国际秩序正在从美国单极霸权格局逐渐走向共存合作的新秩序。构建全球合作共存的国际新秩序是国家间的必然战略抉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国际秩序通常是全球治理中通用的规则和规范与机制,从一般意义上说,它主要由大国塑造,小国遵循实施。而历史上崛起大国往往不满既成的规则和秩序,欲求重新塑造能体现自身价值的“游戏规则”。基辛格则认为,国际秩序“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为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4]。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不仅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还开启了冷战时期两个大国集团的对峙、对立、对抗基本格局。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不平等国际体系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大国集团之间进行较量和权力博弈的产物。冷战结束以不战而胜的特殊形式标志着,雅尔塔秩序和冷战体系走向历史的终结。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本质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观:

第一,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及世界银行三大全球治理机构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并以此为主体构成了二战后的国际规则体系框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个国际秩序是基于多边主义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管理”而

创建的,反映了二战后的战胜国主导的设计理念。“冷战后美苏两大集团隔绝的消融和多边主义的提升,使得这个国际框架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它提供的基本规则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5]。不可否认,既有的国际秩序在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由西方大国主导控制的,中国与现有的国际秩序关系和国际体系也曾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角色转换。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中国基本是一个经济自我循环的封闭型国家。对外开放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但是仅仅是参与者,居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发挥的作用有限。当今中国,日趋走近国际体系经济政治的中心位置,这就意味着中国必然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并且是国际秩序的改革完善者。

第二,冷战结束后,美国以胜者的霸权自居,构建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美国领导下自行其是、不受任何外来政治力量和规则约束,更不愿意接受联合国为主体国际秩序制约的单极霸权的世界秩序。“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实行政权更替,以新干涉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构筑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主义世界新秩序”^[6]。美国在国际组织机构之外缔造和主导现存国际秩序,其内在核心构成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众多双边、多边军事联盟的盟友国家、准盟友国家以及朋友关系,他们有着相同的民主价值观,有共同一致的“假想敌”威胁,在观念上具有排他性。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构建了全球安全体系框架,并把联盟圈子信奉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合作基础,把盟友国家的安全利益优于并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不惜通过侵害他国安全来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并且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和盟国安全利益,往往视联合国及其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而不顾。“美国加紧打造军事安全同盟围堵中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正加紧主导建立一个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太军事和安全同盟或准同盟,即亚洲‘小北约’,而这个‘小北约’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7]。“亚太地区某些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两面性政策,近年来也愈加突出。导致亚太地区,特别是东海和南海地区两个高危地区战云密布,险象环生,几近失控”^[8]。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和美元货币地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两大基础支撑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实质是进一步拓展其全球利益、进一步

深化美国世界霸权格局观。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力量格局的演变,20多年来西方国家遭遇了冷战后甚至近百年来最深刻的一系列挑战:从9·11事件带来美国安全心理防线崩溃,到全球金融危机摧毁西方金融经济网络。“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乱象纷呈。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地缘博弈多线推进,热点问题交替升温,恐怖势力扩散蔓延。英国脱欧惊动世界,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明显抬头。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面临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冲突、变革与守旧的抉择”^[9]。这一切都集中指向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即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声誉和领导能力在急剧衰退,其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面临整体性困境和群体性焦虑。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秩序暴露的诸多弊端和引发的政治社会动荡说明,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需要以新思维和新治理方式去引导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的深刻变革。崛起的中国已走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日趋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因此,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秩序处于岌岌可危境地,预示着当今世界美国的单极霸权秩序,将逐步为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国际新秩序所取代。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新型大国观的核心理念

环顾全球,国际体系正在转型,国际新秩序正在磨合,国际新格局正在构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和大调整及大变革的时代。“当前国际体系正在面临第三次转型,美国主导、或者说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新的国际体系将向东西方共生方向转型”^[10]。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时期,中国将在其中扮演日益突出的主导作用,成为决定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与未来走向的关键性角色。中国日趋全面深入走向世界,影响着世界,并成为构建未来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战略力量。当今我们正处于世界大变革的时代,并且也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和有所作为的年代。全球主要大国纷纷都在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未来趋向,以及国际体系的转型思考新的理念和新的方案。随着中国的复兴和经济崛起,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尤其是当前世界面临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滋生蔓延,以邻为壑分歧冲突不断,全球治理问题遭遇挫折及挑战。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普遍呈现失能和失序,他们要么试图退缩自保,要么从中谋求私利。面对一

系列国际体系变革和全球化逆转的态势,欧美大国拿不出根本有效的全球变革治理的新方案。而逐渐走向全球中心的中国何作何为,是否能提出国际体系变革的新方案,能否为国际秩序的调整完善提供源头活水和生机活力,就必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并受到高度关注。中国在世界角色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深度互动关系,国际社会期待在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中国的独特作用。中国的崛起破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一全球性困惑,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向世界提出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中国韬略。习近平主席把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提升到历史新高度,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行“强伴弱盟”的国际关系伙伴化,实现和平发展,普遍安全,共同繁荣。习近平明确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使命与时代命题。为坚持中国新型大国外交的新境界和新思路提供了理论导向,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革规划了行动纲领,在传统国际秩序深度嬗变的背景下,我们走出了中国道路,提出了中国方案,融汇了中国理念,凝聚了中国智慧。中国崛起的大国外交“兼善天下”并呈现为一种和平性、内源性、内敛式的基本特征,它集中凝练了当代中国外交勇于履行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并且把新型大国外交思想和理念都容纳于其中。

当今世界,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面临的关系挑战是“不同形态的文明在其相遇时都会碰到两个困惑性的命题,一是在互动中坚持住自己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二是如何形成可持续交往的共同价值和规范,避免对抗,求得和谐共生”^[11]。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的会议上多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愿景,提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在长期的国际关系探索中,找到了国家间政治文明和国际关系亟须确立的共存规范与共享规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新型大国外交观的精髓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创新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探讨究竟哪一种文明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是主导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普世准则,问题的关键是在承认文明多元化的前提基础上,如何实现大国之间多元文明的互补、互依、互存,求同存异,聚同弱异,共同发展。避免对抗与冲突,谋求和谐共存共处共生准则,遵循人类社会“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的历史发展规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世界看作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系统,世界上主要文明国家间的政治文化社会都是命运与共、利益与共、责任与共,这就为正在处于困惑与期待中的新国际秩序构建提出道路的选择及其中国的方案。中国新型大国外交是把世界各国的利益乃至人类的共同利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共同发展,这就摒弃了传统大国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性是“合作共赢”,共赢的本质属性是强调“共”的内核精髓。如果从人类和全球的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仅仅是个时空概念,但是从它的内在蕴含层面看,它涵盖着丰富精辟的思想体系: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的国际秩序观,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型安全观,“一带一路”建设,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弘扬人类共同价值的旗帜,运用聚焦议题,突出特色,打造亮点,以主场外交掌控的议程和主题设置主动权,形成一系列具有包容性、引领性、开创性、机制化的丰硕成果。从全球道义的制高点上,发挥大国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内在驱动力,为国际合作共赢筑就根基。这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命题,是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民族国家及意识形态的全球观、文明观。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获红利。用中国积极作为的实际行动,为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正能量和新模式。“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构建世界各国共有共享的全球体系已具备条件,国际格局正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向各国共商共建的全球体系转变”^[12]。因此,中国新型大国外交理念上的创新,即共存、共建、共享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本质属性。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打造从利益相存到命运攸关的全球共存观,这是一种新型的国际规范和价值体系。和谐共存作为一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全球化把世界各国带入一个经济利益相互依赖、关系彼此密切的共生共存的系统中。以全球的共同利益为根基,就需要深刻认识把握人类利益与全球利益休戚与共的统一性。在处理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中,既要承认全球的人类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要兼顾各个国家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不平衡。不仅要维护和拓展民族国家的

正当利益诉求,还要寻求全球的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解决各国国情的差异矛盾分歧中,服务和服从于全球人类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提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在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主要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的格局变化。随着全球的挑战性话题日趋增多,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也在此消彼长,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强化全球共生观、全球治理观、全球共存观念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符合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顺应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必然逻辑要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造的新型政治文明观。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树立互信协商的普遍安全共建观。从共建价值观的思维出发,有助于大国外交从新的维度,来考虑解决全球治理中的普遍安全问题,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共同安全为基石,强化国家间的协商与互信,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及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解决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安全共建问题,需要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大国关系;大国与小国的相处之道是遵循和平共处原则,大小国家平等相待,而不是以强凌弱,遵循的也是安全共建观;国家与国家之间坚持合作互利共赢,抛弃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其中提倡的遵循准则也是共建的价值观。几百年以来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与理论及现实已经反复证实,“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13]。当今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特征呈现为,由传统的通过侵略扩张、划分殖民势力范围来争夺国家利益和强权政治已成为历史记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规则和国际事务,正逐步向各国以制度建设和规则协调关系的趋向演进。全球事务和地区治理需要各个国家沟通协商办理,遵循国际规则,建立国际机制,谋求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和目标。中国正在“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迄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愈加广泛”^[14]。因此,只有共建各国间的平等互信与认同包容,才能化解局势危机,走出安全困境,构筑安全屏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存共建共赢的安全之路。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以各国利益为纽

带实现合作共赢的利益共享观。中国不但坚持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积极打造成果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以国际社会为“利益共同体”的全球意识,积极寻求各国经济利益最大公约数,携手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在面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盛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率先提出倡导并支持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这就表明中国把自己的发展成就和成果分享于世界各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型大国的宽阔胸襟与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建设利益共同体的自信与定力。“在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6 000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7 5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达7亿人次,这都将继续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14]。“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周边外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都是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注入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及中国模式。中国奉行的全球共享观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涵盖于文化与安全等整体利益上的共赢共享。这些“成果共享,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15]。因此,利益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其超越了国家的利益差异性和狭隘的民族观念,立足于建设开放包容与普惠价值的合作框架,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三、“一带一路”:以合作共赢促建命运共同体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维度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为了提升大国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遵循的必然逻辑一定会提出“引领国际格局未来走向的价值理念与合作机制以及制度性权力”。“一带一路”就承载着以合作共赢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东方的伟大使命,“一带一路”的根本目标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344号决议就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联合国首次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安理会决议中,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目标的认可与共识和积极支持,意味着“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正在日趋成为世界方案。中国政府倡导“一带一路”其中的关键词就是邀请世界各国“上车”,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整个世界带

来的是共享经济发展繁荣与合作共赢。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与历史上的西方大国崛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百多年前世界大变局带来的大动荡大调整,留给亚洲国家的是血与火和坚船利炮痛苦的历史记忆。而今,中国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或取代西方的海洋文明对东方的大陆文明的主导力量。“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带来的是通过合作寻求共赢之路,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以及责任共同体的实质性创举,代表着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将产生深刻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影响力。其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蕴着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国家历史传统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那种不是以邻为壑,而是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以邻为友的合作共赢关系。这是中国新型大国外交正在影响这个世界,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正在塑造这个世界。曾几何时,西方某些大国和政治精英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冷眼旁观,试图从中论证这是二战后大国崛起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再版,或者从中极力寻找这是中国新朝贡体系的翻版。其表明国际社会在认可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也在质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担忧此举是否将对西方社会带来不利的国际影响。西方大国之所以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原因就在于他们长期以来,都是按照西方传统大国崛起的进程考虑问题和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逻辑就是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以及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与利益竞争。根据这一考量推理,中国的崛起和全球权力的转移必然削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必将打破和冲击现有的国际格局的平衡。为此,21世纪以来,美国强化了对中国崛起给予战略制衡和围堵防范,从中美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定位,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外交布局,这一切都源于西方大国传统的国际关系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

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实施发展的实践证明:“一带一路”遵循共建共商共享原则,各国共同参与合作,是互利的,是共赢的。现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与中国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已有50多个国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并且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对象国,2016年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达14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税收并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是惠及民生的系列工程。“一带一路”就其顶层设计而言,初衷就是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为开放

普惠包容趋向发展,向世界开放,兼容并蓄,互惠互利,谋求共赢。“尤其以2016年杭州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对很多国际问题提出‘中国方案’”^[16]。中国扮演着“一带一路”实践中的首创者、合作者、引领者等三重角色作用,而非谋求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战略经济利益。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精髓就是倡导天下大同理念和天下一体观,包容联动、互联互通、协商共赢是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性。

“一带一路正在为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一种‘共治格局’下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它将对世界经济运行再平衡、国际利益格局再平衡以及全球治理格局再平衡发挥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17]。“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相伴相生。“一带一路”是在全球治理变革中提出的创新性举措,旨在探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机制,并在亚投行合作机制的运行中,制定新规则,践行新模式,实践新理念,引领打造“新型全球化”和提供新型公共产品。近年来,全球化进入大变革时期并面临严峻挑战,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政治右倾化思潮泛滥,体现了当今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处于徘徊低迷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功能耗尽,难以形成推动全球经济的内在动力。因此,在国际秩序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同时进入“调整期”和“转换期”过程中,解决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难题亟待新方案、新思维的出现。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纷纷寻求在新旧功能转换时期,变革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拉动内在驱动力的新道路、新模式、新功能。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转向哪,如何转,由此面临重大的战略抉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显然无法承担‘当头’的角色,但无论从本身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来说,中国在这个时候要能够在推动市场开放、维护全球化大趋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本质上推动新型发展合作。构建的是大区域开放型发展,不是封闭型的,而是开放合作框架。如果能够坚持下来,一定会形成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机制”^[18]。“21世纪国际政治与既往历史的最大不同,恐怕就在于合作将成为主导性的国际关系模式”^[19]。“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开创和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向,变革传统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引导新型全球化、构建新型合作观、树立新型共赢

观。在更高更宽泛的意义上,超越传统的地缘经济政治发展逻辑,推动全球构建一个全新的地缘经济政治文明网络。“独行快、众行远”命运与共、利益与共、责任与共,是崛起的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必须履行的大国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19.
- [2] 蔡拓. 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转型仅处于起始阶段[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2-11.
- [3] 何亚非. “后美国时代”来临是历史必然[N]. 环球时报, 2017-08-15.
- [4] [美]亨利·基辛格. 世界秩序[M]. 胡利华, 林华, 曹爱菊,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序言 XVIII.
- [5] 傅莹. 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J]. 新华文摘, 2017, (10): 2-5.
- [6] 杨卫东. 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J]. 现代国际关系, 2017(6): 1-17.
- [7] 郑永年, 张弛.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J]. 当代世界, 2017(8): 4-7.
- [8] 于洪君. 裂变的世界与崛起的中国[J]. 东南亚研究, 2017(1): 1-18.
- [9] 王毅. 在世界变局中坚定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J]. 求是, 2017(1): 13-15.
- [10] 林利民. 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J]. 现代国际关系, 2009(6): 1-8.
- [11] 苏长和. 共生是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内在价值之一[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2-11.
- [12] 陈玉刚. 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全球战略和角色[J]. 当代世界, 2017(9): 8-11.
- [13] 董俊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困惑与破解[J]. 时事报告, 2017(2): 111-124.
- [14] 苏格. 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J]. 国际问题研究, 2017(5): 1-21.
- [15] 张宇燕.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9): 4-9.
- [16] 金灿荣. “非西方”的中国为何能快速崛起[N]. 环球时报, 2017-09-19.
- [17] 竺彩华. “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再平衡进程[J]. 和平与发展, 2017(5): 69-85.
- [18] 岳巍. 反思全球化: 构建经济新动力和机制——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张蕴岭[J]. 领导文萃, 2017(8): 7-22.
- [19] 吴心伯. 大变局时代的大国战略[N]. 环球时报, 2017-08-14.

(责任编辑: 刘建明)